

# 感 念 葉 公 超

(本文插圖刊第42頁)

● 定 中 明 (外交部顧問、國立政治大學前阿語系教授兼主任)

## 歸國途中遇到統戰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先總統蔣公介石尚未復職視事，大局未定，人心惶惶，那時我正在駐伊朗大使館服務，眼見國事日非，心焦如焚，卅九年二月忽奉台北外交部電令：駐伊朗大使館職員三人——代辦賀之俊、祕書林承輝及本人均留職停薪，另調駐泰國大使館原已遣散之二祕岳崙代理館務。我們立刻變成了難民，賀之俊調回國，林承輝和他俄籍太太則於大罵政府之餘決心回大陸，並誘脅我也回大陸去，我沒理會，他們不久就走了，只剩下我一家六口，流落異邦，舉目無親，徬徨無主，幸得伊朗教友長者卡茲密醫師(Dr. Kazmi)(波蘭籍夫人，有一男一女，與我年齡差不多)，因平時交往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他知道我的處境時立刻伸以援手，慨然相助，撥出一套房間，水電廚浴俱全，免費借給我們一家人居住，這種盛情厚誼終身不忘，但我已決心設法返回自由祖

國——台灣，便立即向英國大使館申請香港過境簽證，耐心等待，一九五〇年六月下旬韓戰爆發，我直覺地認為這是我政府光復大陸的時機來臨，非常興奮，立刻束裝，準備東歸，而我們的香港簽證也剛好通知獲准，遂於是年八月下旬離開伊朗，乘輪經波斯灣至孟買，轉乘英輪「廣東號」直放香港。在輪上遇見從倫敦回大陸去的廿一名中國左傾留學生，他們說原本是我政府以公費派送的留英學生，現在要回去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他們每天包圍我，想說服我一同回大陸，他們還保證說，以你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專長，一定會為「新政府」所重用，當他們知道我是回教徒以後，還拿出一本名冊給我，上面載有不少我認識的回教知名人士：如達浦生、馬松亭、馬堅、白壽彝等，希望我放心回去，我當時隻身陷入重圍，處處危殆，不得不虛與委蛇，到了香港他們有人來接待，我則下榻九龍飯店，聽說第二天他們來了幾個人找我，恰巧我不在，他們在登記簿上「往何處去」一欄見我填寫「往

台北」之後便匆匆離去，以後沒有再來了。

## 老長官給我落腳地

到達香港以後會見了幾位同事和同教，才知道台灣方面的進一步情形，首先知道了蔣介石總統業已復行視事後，國家恢復了領導中心，葉公超先生真除外交部長，回教協會也隨政府遷台等大好消息，令人非常興奮鼓舞，恨不得立刻插翅飛去，可是當時台灣的入境管制很嚴，從外國回來的公務員外交官也得經過一番祕密調查，認為思想無問題後，還得台灣方面有人作保才發給入境許可證，我在香港呆了三個多月才拿到許可證，事後才知道為我作保的是前駐伊朗武官，嗣任國防部二廳主任的劉方矩兄，他們賢伉儷還親至基隆碼頭歡迎我們，這項珍貴的友情也是令我感念不忘的。民國卅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抵達台北，下榻「錦江飯店」，打聽到了外交部的地址，它在延平北路一家破舊原叫「小春園」的茶樓裏辦公，簡陋寒儉，無以復加，入門後我找到了亞西司

，那時還沒有司長，由勾幫辦增啓暫代司務，我與勾老在重慶外交部曾有過一面之緣，他見到我非常高興，立刻帶我去見部長葉公超先生，這是我與葉部長初次會面。經過勾幫辦的一番介紹與推荐之後，葉部長立刻伸出大姆指表示讚揚地說：「了不起！了不起！你可說是一位忠貞之士，我們這裏有人向外跑（其後始悉乃指不久前由台北赴香港轉往北平的前外交部亞西司第三科科長吳建勳而言），你居然帶著一家大小投奔政府而來，我們非常欽佩，也非常歡迎你回來。」葉部長當時對我講的這幾句話使我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他當時說話的聲音有點激動而面色凝重，他立刻叫人把當時的人事處長田方城兄找來，對他說：「你把他定中列入優先回部人員名冊內。」（按當時外交部人事凍結，全部只有九十七人。）

爲了我回部以前的生活問題，葉部長立刻回到辦公桌後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教我拿去找當時中國廣播公司的董事長張道藩先生，第二天我見了張道藩，他拆開信一看，立即表示歡迎（原來信裏介紹我到中廣開創阿拉伯語廣播節目），張道藩說：「定先生，開播日期由你自己決定，至於節目內容如何安排，請你和節目部主任邱楠先生商談。」我隨即答稱：「最好就從明（四十四）年元月元日開始。」他連說好極了！張道藩此後對我也特別照顧，令我非常感激。

自民國四十年起，中華民國的國運日見昌隆，在先總統蔣公介石的英明領導之下，百廢俱舉，氣象一新，國際形勢大爲好轉，外交工作積極展開，於是外交部不久也就搬到了博愛路台灣銀

行後面的新址辦公，同年七月中旬忽奉外交部部令，發表我爲「專員，分亞西司辦事」。我終於回到外交崗位上來了！當時亞西司主管中東各國事務的第三科科長一席，尙虛懸未補，由我暫時兼理科務。兩個月後就正式改任第三科科長，這當然是葉部長對我的特別提攜。

### 調派赴美治我痼疾

我在外交部上班，每天白天工作，下班後留在辦公室內繼續準備電台的稿件，包括新聞及短評，然後騎單車趕往新公園的中廣播室播音，嗣後改爲錄音俾午夜播放，每天總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能回家吃晚飯。我十幾年前離埃返國經滇緬路即染患甲狀腺腫病，流虛汗，手發抖，脈搏快，眼球突出，心臟逐漸擴大，十幾年來沒有根治，但精神一直很好，並未影響工作，可是葉部長却看在眼裏，記在心裏，老長官已經顧慮到我的健康而默默地安排爲我治病了。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九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到外交部上班，一進大門便有很多同事向我道喜，我問他們，喜從何來？他們都說我裝糊塗，使我莫明其妙，等到了司裏，同事也都向我恭賀，我問他們究竟是甚麼事？他們說你真不知道？我說真不這道。他們才說你要到聯合國開會去了！不久人事處來人通知我立刻去填表好辦理出國手續，同時也收到了部令，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大喜事！比外放還高興。那年由國內派往聯合國去的團員五人計有娜雲亭、凌楚珣、胡國材、貢祖春和我，我記得我們五人先行，經日本

東京轉洛杉磯再飛紐約，而葉部長則偕同當時條約司長王（大使）之珍稍後才去，葉部長下榻華爾道夫大飯店，當時我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爲蔣廷黻博士。葉部長第二天主持了首次團務會議，參加的人很多，會議室都坐滿了人，氣氛輕鬆和諧，那時我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還不甚嚴重。下午我們去聯合國參觀大會會場各理事會會議室、聯合國卅六層高的祕書處大樓等地方，所見所聞無不新穎，引人入勝。聯合國大會開幕那天我們都參加了儀式，莊嚴隆重，氣象萬千，印象極爲深刻，隨後代表團團員分組參加工作活動，我被分到特設委員會，主要討論巴勒斯坦——即阿以糾紛問題，蓋與我的業務有關。在聯合國及我代表團中確實可以學到不少的東西和增加許多經驗，誠不虛此行。

大會過了一段時期，有一天葉部長找到他在代表團的臨時辦公室去，對我說：「你到美國來以後，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把你的病治好，醫藥費用你不用擔心。」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部長派我到聯合國開會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治我的病。一位長官如此關心一個部屬，爲他設想那麼週到是很少見的，這時我心中的感激，真是難以言宣！後來我經過當時我駐紐約總領事館裏的一位同事阮昆利兄的介紹，找他的一位猶太醫師診斷，必須動手術切除一部份甲狀腺，就由他在一所小型醫院中施行手術，非常順利成功，四天後就叫我出院回「家」——旅館休養，結果住院醫藥費三百多元概由葉部長私人代付，手術費四百元，經與猶太醫師情商結果竟打對折收取，使我

對猶太人的觀念大為改變，誠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對一個民族的評估決不可一概而論。葉部長恢復了我的健康，恩同再造，這一大恩沒齒不忘，我今天之所以能為國家略效微勞者，飲水思源皆超公之所賜，亦正想藉此圖報答於萬一耳！我從聯合國回國不久，於四十四（一九五五）年二月發表駐黎巴嫩公使館（後昇格為大使館）一等祕書，五月攜眷經埃及前往貝魯特履新，四十八（一九五九）年某月葉部長率團訪問中東各國，首先訪問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然後分訪黎巴嫩、土耳其、伊朗等國，我在黎京貝魯特參加接待工作陪同訪問及授勳等活動節目，曾與葉部長有數日的接觸，非常愉快。四十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底我奉調至西非茅利塔尼亞任參事代辦；這時葉部長已調任駐美大使。五十（一九六一）年，茅利塔尼亞與外蒙入聯合國案發生後，我和葉大使曾有過函電的交往；五十四（一九六五）年，中茅斷交後我奉調回部，這時葉大使亦已卸任返國，嗣改任政務委員。

### 建清真寺招待國賓

葉部長於民國卅九年奉蔣介石總統之命展開對中東及中南美的外交工作，他於四十六（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紐約晉見了正在訪美的沙烏地阿拉伯的紹德國王。除了禮貌拜會略談加強兩國關係外，曾代表蔣總統向沙王致意並順便邀請其訪華，沙王當即欣然接受，訪期以後再定。葉部長回國向蔣總統報告後立即想到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台北還沒有一所像樣的清真寺足以接待像紹

德國王這樣的東中東國賓作禮拜的地方，他馬上和中國回教協會的領導人磋商籌建一座規模宏大而具回教建築風格的大清真寺，以便配合國策，準備接待今後不斷來訪的回教國家元首、閣揆、政要及宗教領袖之用。於是乃有今天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的巍峨壯麗的清真大寺的出現，為台北市平添一景。葉氏眼光之遠大，氣魄之雄偉，實在令人敬佩。這座清真寺是由回教人士集資購買了現址約八百坪的土地後，而由葉公超先生擔保向台灣銀行貸款四百萬新台幣興建而成；施工兩年餘於四十九年四月落成。開幕之日陳誠副總統曾親臨參加，儀式隆重，盛況空前。

該寺落成後，沙國紹德國王雖然沒有如願來訪，但它却接待過不少中東回教國家的元首政要及宗教領袖，如伊朗前王巴勒維、伊拉克前攝政阿布拉杜拉、約旦國王胡笙、王儲哈珊、土耳其前總理孟德瑞斯等，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沙故王費瑟訪華時曾在該寺禮拜，其後沙內政部長納以夫親王、同盟祕書長哈爾康等宗教領袖來訪，都曾在該寺禮拜，受到教胞們熱烈歡迎，充分發揮了招待國賓的作用。但是該寺的建築費貸款償了一部份後即無法繼續償還，每年都由葉先生向台銀作一次延期擔保的簽字手續，最後還是葉先生另行設法予以清償，教胞們對葉資政的盛情永誌不忘。

### 墨寶遺暉終生紀念

葉公超的書畫早已蜚聲士林，名重一時，生前向他求墨寶者不可勝數，未必人人都能得到，筆者有幸，於五十七（一九六八）年于役北非利比

亞時，荷蒙他賜贈書畫各一幀，以壯行色，筆者視如珍寶，愛似拱璧，在利比亞班加西找名匠裝框懸掛客廳中，朝夕觀賞，睹物思人，倍覺親切。其書為：「五月天正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新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題款為：星吾兄屬書少陵句，戊申春 公超（印）。其畫為竹石圖，題款為：星吾兄將有遠行，為寫竹石圖贈別，戊申春仲葉公超（印、印），右下方尚蓋有篆字「公超雙精」圖章一方。此兩物現已成絕筆遺墨，意義尤深，價值更高！我自五十九（一九七〇）年由利比亞以公使調部後，自動要求不再外放，寧願留在國內服務，國家宗教同時兼顧，葉公超先生也由駐美大使卸任後定居台北，平時雖很少見面，但每逢年節，我總要攜帶應景薄禮，親至他的寓所賀節拜年，敘談一番，至為快慰。

記得民國六十八年底超公電話找我去他設在行政院新聞局後院樓下的辦公室，要我幫他整理一點資料，寫一篇有關加強中沙外交關係的文章，我答應了，但是因為雜務太忙，不能一氣呵成，早日交卷，拖了很久才拿去，經過超公的幾次三番增刪斟酌，直到民國七十年初才定稿，題為「葉公超先生談中沙早期關係」，葉公超口述，本人筆錄，總算完了一場心願；過了幾天我去他公館裏看他的時候，他非常高興。他說，你要的字和畫我一定辦到。我說，不用急，等您身體復原以後再說，後來他忙我也忙，就沒有再催，誰知我沒有福份多得他一點墨寶，他竟與世長辭了，令人不勝感念之至。